

往事

——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

第一百二十一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

编者的话：“杀头我不怕，就怕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。”说这话的江青像个悲剧中的角色，她谈论的正是她的将来。

但是，明明已大祸临头，却不知为何还在那里做白日梦。她撇下临终的毛到虎头山去逍遥自在，并且在小靳庄大谈其母系社会，似乎登基之事就在眼前……对于即将到来的局面，她既无知，亦无能，对权术一窍不通，白白跟了毛大半辈子，除了学了点毛体字，并无寸进，骨子里还是那个混迹于十里洋场的女愤青。对此，毛心知肚明，说“她不代表我”，并敲打她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，而她却毫无所悟，甚至在毛死后还说“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……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。”——竟然想挣脱毛自立门户！此刻，她全然没有觉察四周的罗网已经收紧，而毛的巨大的身影已经不再，使她失去了最后的屏障。事态顺着致命斜坡向下滑去，一直滑向谷底。而这一切，同样是在毛的名义下进行的，叫做“继承遗志”。

令人惊异的，倒是一向桀骜不驯的江青在被抓捕和地下关押期间的驯服。她没有进行抵抗，就完成了从主子到囚犯的改造过程，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状消失，成了一个“正常的人”。这让人想起“解放后”对溥仪、“战犯”和知识分子的改造，似乎暗示了一条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解脱之路。

马晓先女士见证了这一过程。正如她照看的对象从主人变为囚犯，她的身份也从护士变为看守。无论彼此，相似的困境在于，都处在一种囚禁的不自由的关系之中，所谓“他人即地狱”。而这种关系的翻转，也不能使双方解脱。

当双方的角色刚刚转换的时候，和全国人民一样，马女士觉得这是“第二次解放”。那么第一次解放呢？想必是一九四九年那次，看来解放不是一次性的。不过这“第二次解放”是从原先的解放者的压迫下获得的。这种多次的解放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。

所谓解放就是“翻身作主人”，就是把原来的主人压在身下。然后这一逻辑又被延伸至其他人和“新主人”的身上，于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放。其实，按老祖宗的原意，解放就是把人从主奴、看守与囚徒的关系及其一次次的翻转中彻底解脱出来。而这是江青之类数典忘祖的“主义者”们所不了解的。在他们的想象中，要么就是压迫，要么就是被压迫，二者必居其一，你死我活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。这种想法造就了他们无法摆脱的现实：不是人上人，就是阶下囚，所以江青说：“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。”不知悔改，也无力悔改，一条道走到黑，这就是江青和“主义者”们的悲剧。

江青有一条自信的底线：我不会犯路线错误（在法庭上她就是这样自辩的）。殊不知她赖以安身立命的“路线”已随毛而去，无论正确与错误，都当不得救命稻草。

保健护士谈江青（下）

口述者：马晓先，女，1944年生，1974-1976年任江青保健护士

采访者：郑仲兵、李宇锋

参加者：杨银禄、阎长贵、赵柳恩、周淑英

时间：2006年2月25日，11月18日

初到江青处的印象

李宇锋（简称：李）：您是江青最后一位护士，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，还看了她一段，从服务到监护，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。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。

马晓先（简称：马）：我们的工作护理，做具体的事情，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，听到的，看到的，就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点事，至于我们说来说明它是什么问题，我们不做结论，由每个人自己去推测和思考。

杨银禄（简称：杨）：关于护士工作这一块，小周（周淑英）、小赵（赵柳恩）都谈过，她们走了之后的部分请小马你细致地谈一谈。

马：就像前面她俩说的，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样，什么都管，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。

我想起刚进十楼时候的那种感觉。感觉什么？就像在电影里一样：她起床，打铃。一听到铃声，护士就赶紧给她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，递体温表量体温，服务员就赶紧送开水，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，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……就这一套吧，只要这铃声一响，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了。我当时的印象挺深，就像过去贵族大家庭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后来慢慢就感觉到这份工作不好做，气氛不太好。

当然，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，互相配合，特别默契。我主要是接小赵的班，交接班特别细。实际上，大事真的不多，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，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些细小的事上，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，但是一到这儿真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。而且我在那段跟她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，小周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，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了，比如起床要抱起来在底下塞个羊毛靠垫然后再躺下的程序，我没有经过。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她的衣服准备好，她起的时候我们帮她穿。

赵柳恩（简称：赵）：别的呢？

马：其它的都一样的。报天气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她出门之前也要点根香，看看风向，到后来我们就在楼上弄一面小红旗，看风向。但是就这样有时也不准确，有时我们看着是东南风，等她出来的时候坏了，风向变了，她一出来又有汗了这就坏了，这就成了大问题。

在这儿工作，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：你只要组织上服从，把工作做好，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，也不要多给家里打电话，不要跟家里说，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，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。

在她的工作人员当中，我算是比较顺的。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，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，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走，随时可以。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，知道这儿工作难做。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，从李讷怀孕之前那次发烧我就管她，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、用药，还有产前的准备，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。产后的恢复期，吃中药的调理，都是由我来护理的，直到孩子出生以后她请了阿姨，有三四个月后才离开。

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，由我们的处长陪着（陪我去的还有张敏，她是服务处的服

务员)，汪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，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。我不愿意，说我爱人得了急性肝炎，全身都是黄的，真不适合到那儿去，要传染上这个责任怎么负啊？不要说我了，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！汪主任一听也有点害怕了：“那就算了，算了，我再找吧。”过了一个多礼拜，他又把我叫去了（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，他是我们的副主任），说你这就得去，她的条件：第一护士要科班出身的，第二要脾气好的，再就最好生过孩子的（因为对孩子要有耐心啊，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）。汪说你挺符合这些条件的。我说如果我要去朱老总那儿李先念那儿或董老那儿我都没问题，我都愿意去，但真不愿意去她那儿，因为我听李讷说过她妈妈的一些情况。汪东兴说：“现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儿。”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，汪特别生气：“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？”我说是。“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？”我说我服从是服从，可思想上不通啊。他说：“你思想上不通没关系，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。”

赵：让你到她那儿去，汪还在我们那儿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不像话，娘俩个人抢一个护士！”江青说要把你弄来，但女儿又不愿意放，她们娘俩就闹起来了。

马：当时我没办法，就去了。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了，就是和她见个面，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，好像没说别的，连手都没握。

我记得比较清楚的，是第一次给她送药的情形。当时她正在大会堂开会，到了吃药的时间，我就进去了，说：江青同志，该吃药了。因为是第一次，她特别警惕，药含在嘴里，一边看表，发觉提前了一两分钟，噗！就把药吐了。她严厉地说：时间没到！我楞了：不就差一两分钟吗？吃下去不就到了？可当着那么多中央领导，我也不敢说什么，也不敢站在那里，只好赶紧出去，心里又委屈又紧张。再拿了药，转身又送进去，说“江青同志，吃药的时间到了”。这次她吃了。我当时感觉这里的工作简直太难了。

尽心尽力满足江青的要求

马：说实在的，在她那儿工作，我们是把她的睡觉看作最主要的，只要她睡好了觉，我们大家都高兴。早上起来我们问她睡得怎么样，她说：“还行。”或者“还马马虎虎”，这马马虎虎也行了，她只要睡好了，脸上的表情就觉得还好，回头一跟其他工作人员说，大家都觉得挺高兴的。

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走廊里铺的地毯，因为下面是地板，走起来难免有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忘了是哪位工作人员，在地毯上用粉笔画了不少圈，标出有响声的部位，我们走的时候绕过那个圈不走，走空隙，怕响了以后又影响她睡眠，我在其他首长家可没有过这种谨慎。

我的脾气应该说是比较急的，但在她那工作你得又急又不急：她一打铃，一声你就得到，不快不行，不能让她打个两次三次的；但你走太快了就会喘，那又不行。我们就先走快点，等快到她面前了，定定神，平静平静，再进去。所以当时精神状态比较紧张。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。

当时我还有一个最大的转变，就是生活习惯。老感觉特别累和困，最困的时候，我记得赵柳恩跟我交班，看着那些衣服，看着看着我都打瞌睡了。小赵说你不能打瞌睡，我说我都困得不行了。她就给我抓一大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，加一点水，也就刚漫过茶叶，她说你喝点这个，半个小时就好。那个茶水特苦啊！别说，真的过了半个小时就挺精神的。以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，一困的时候我就照着她这个方法去做。

我们的工作当然是根据江青的生活习惯来安排。比如，她经常晚上到十七楼看电影，她到那儿去是先打牌，再看电影。从打牌开始，到电影结束，我们分三次给她准时准点地送镇定药。看完电影回去，我就跟着她就进卧室了。一进卧室这又不知到什么时候了，得沐浴，更衣，在马桶上坐着，一坐就是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。她的沙发是个沙发椅，底下是个马桶。我们就坐在距她两三米的沙发上等她，还得一点儿不能有声音。你得静静地听她的动静，她

稍微有点声音我们就得注意。等伺候她上床睡了，也早上五六点左右了，但这时候人一般很清醒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你要说不睡吧，第二天要接班怎么办？所以那时候我就拉上窗帘，吃上安眠药就睡了。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吃了个遍，没有我不吃的。过去我一觉睡六七个小时，醒来后头脑特清醒，工作效率也很高，后来在那儿我感觉生物钟全乱了。特别是她外出，要这个要那个，折腾我们来回跑，有时候脉搏都能到一百六，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！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可思议。

在那儿工作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什么都不能落下文字。所以我们交接班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，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针，哪个药该停了，在别的首长家只要写到本上就行了，她这儿不是，我们都是口头交班，不能做什么记录。甚至萝卜吃了半个，那半个在冰箱里边，哪些毛巾、衣服在洗衣房，哪些没用过，在哪里放着，都得交代特别清楚。这些都是汪东兴，还有我们管护士工作的领导要求的，不许写日记，不许记文字的东西，因为这些都要保密的。

那个时期思想上的弦越绷越紧，压力也越来越大。有一次，她把我轰走了。我回到门诊部的时候，同事们都惊讶：“看，小马回来了！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我手里拎着个包，她们问：“你还没吃饭吧？”就赶快给我下点挂面，里面卧两个鸡蛋。我那个感觉，唉哟，当时眼泪就往下掉，心想在那儿谁管你啊？鸡蛋面放在跟前就吃不下，心里就觉得那么累，没有人支持，没有人体谅，这种感觉……（哭），没有经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后来我就跟我的领导反映，他说：“唉哟，孩子！你跟我说可千万别跟别人说，这些东西最好烂在肚子里，烂在棺材里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到江青那儿了，她跟以前不一样！她现在手里有权，又有人，要是给你弄到卫戍区去怎么办？傻丫头你都不知道监狱的墙有多高！”

跟谁说呢？我在江青那儿工作几年我爱人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后来，都到了主席病危那时候了，有一次，我在家睡觉，江青那里来电话催我回去，我急匆匆唠叨了一句“老江婆子”什么的，他才猜出来我可能在江青那里工作。

当初我是生完女儿去她那儿上班的。我女儿是三月份出生的，我是九月份到她那儿去的，歇了没几个月就到她那儿去了。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。我在江青那儿干了三四年（包括后来对江青的监护），说我们为她服务有什么用心？我们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。我们根本不顾孩子，不顾家，什么都不顾了。有一次，我孩子感冒发烧流鼻血，嘀嗒、嘀嗒地流，我也顾不上，回来后看她躺在沙发上睡觉了，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？把孩子弄起来洗洗擦擦，弄个饼干盒子放在暖气上，让她醒来以后有的吃。跟我在一块的护士说：“你怎么敢这样对孩子啊？”我说怎么办呢？我又请不起保姆，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。我出去的时候就听孩子叭叭踹那个门，听着，听着，心里真是难受！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赵：不仅殃及咱们和配偶，还殃及到下一代，殃及到孩子啊！

马：看孩子跟小要饭的似的，心里真难过！现在我们总的来讲，人的大半辈子都过去了，你说这辈子后悔吗？我跟谁讲都不后悔。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党中央，领导人物服好务。你说我们在江青那儿，在谁那儿，都是为中央服务。中央那些领导一天也是十几个小时的工作，也受了不少的教育，在各种困难当中也磨练了自己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也是有很大的收获。

周淑英（简称：周）：你看全国有多少人，其中有多少人像我们这样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啊？仔细想想也挺幸运，咱不后悔。在这期间，和这些人接触，知道我们国家在前进当中还有这么些东西，虽然对个人、对家庭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你见证了这段历史，别人没有经历的，你经历了，回过头来想想它也是我们的一笔财富。

江青的起居折腾人

李：早就听说江青对身边人特别苛刻，作为二十四小时贴身服务的护理人员，想必您有

深刻的体会。

马：我们不是秘书，主要和她是生活上的接触（当然也能看出她一些政治上的习惯。比如，她看报纸，每次都特别关注她的名字、照片登在哪个位置上，一旦不满意，就会有情绪反应。她真是很重视，每次报纸一来就赶紧看）。虽然她只是政治局委员，但发号施令起来比常委还管用，比如有时候她睡觉前告诉我们明天八点叫她起床，九点有会，我们到时候叫她，她不起，说：“我不行，我还想再睡会儿，告诉他们让会议延迟，延迟到十点半。”我一听，这开会都是关于国家的大事，说延迟就延迟啊？当时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知道她的生活节奏是可以决定、改变整个政治局的日程的。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更加格外谨慎。

即使这样，她还是动不动就责备我们工作人员。1974年五一节，中山公园音乐堂有一个活动说让江青去，江青也准备去，但后来因为不舒服她就没去。当时问她，她说再说吧。这时秘书就不好通知她活动时间。本来三点钟的活动，她三点半才打铃，你说这怎么通知啊？但是她坚持去。去吧，快到音乐堂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不行，我出汗了，我不去了。”然后掉车就回去，这件事她竟责备我们：“你们就是让我紧张，让我出汗。”

1974年江青去天津，我给她打前站收拾房子，连夜走的，把她房间的东西都给她准备好。每次都是办公室一块、卧室一块都收拾好。她到了以后，对那个房子不满意，说这个房子不通风，说：“还有哪个楼啊？”我们一开始布置的是二号楼，后来说有三号楼和四号楼，还有一号楼（是个俱乐部）。我们先搬到三号楼。搬到三号楼后我们又重新折腾一遍。折腾完后她还不满意，第二天又搬到四号楼。到第三天又搬到俱乐部。宾馆里一共四个楼，全都折腾了。搬到第三号楼的时候，当天晚上就睡在那儿。她住下了，我们当班儿的人一块去看她。她正好坐在沙发上，我就给她倒杯水，我觉得水温差不多，不凉不热，就给了她，她喝了一口，噗，一下子全都喷在了我身上！我真没想到！我站得离她很近，是一点准备也没有，弄得我浑身是水……。她说水太烫了。这不可能！因为我很小心的，当时我心里很明白这是要找茬了。她说：“你让我怎么喝？太烫了！”她这一举动，当时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懵了！我从来没受过这个气，心里觉得很难受，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弄了，只觉得委屈。你想，连夜赶到天津，给她收拾房子，忙活，又受她这种气，真憋气！我不知道怎么就晕倒在那儿了，也不知道是谁给我抬出去的。

李：当时你倒在地上了？

马：对，一下子倒在地上了，人不行了。后来是谁抬我不知道，我看到有人的影子，说“赶快给抬出去！”抬出去时经过程师傅那儿，程师傅就给我煮了一碗面，面里还有鸡蛋。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！江青的举动对我是一种污辱，她就差拿杯子往我身上泼了。她说那水烫，完全是瞎说，我怎么能、怎么敢拿烫的水给她呢？！我就跟程师傅他们说，你们现在就去摸摸那个水，绝对不是烫的！——这是我刚接班时遇到的一件事，印象深刻，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
赵：后来你在十楼又犯了一次病。憋气，喘不上气来，好像也是因为她的事。当时程师傅说：“坏了，坏了，小马又犯病了！”后来我就上前去，一把把你拽着，我说走，我们两个到外面去，喘喘气，免得在屋里喘不过气。咱俩到十七楼前面转，把气出出，就偷路边的葡萄。那会儿天已经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就到处抓，后来到亮灯地方一看，我说得了，把生的抓下来了。然后咱们俩就坐在那儿笑，你笑完了我笑。笑了半天，我说你好点儿了吗？你说好点了。完了我说再去偷，管它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呢！你跟我说：“我真不想让你走，工作我愿意和你一块干，但是要是按照你的身体我真希望你走，要是按工作的话我真愿意跟你在一块儿。”我们说了几句知心的话，又在路上转了几圈，心情好点了就回十楼了。

你也曾经救过我一码，我一直不能忘记。有次我头疼的厉害，那天是你接我的班。江青把我叫上来，劈头盖脸地说：“瞧你死样子脸，没个好脸色！”唉哟，我一声没敢吭。

马：她也知道你要走了，所以特别恨你。

赵：她就这么说我，我都没敢说 I 病了。我当时头痛得都不行了，拿着被子把脑袋压着，你也帮我。你说：“这样行吗？”那时候你还没正式上班呢，新来的护士接班的时候交接班得好长一段时间适应。不是说干不了，是江青适应一个人得很长时间。后来你就上班，我说你快去吧。你说：“好吧。”过了一会儿你拿来了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，大的一百五十毫升的针管，你说：“来，我给你打一点葡萄糖。”那天我心里热乎乎的，你这样关心我，我特别感动和激动。反正在那儿大家是互相关心的。

周：当时我们二十多岁出头，每天都很压抑。小赵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小周啊！只要我一听到打铃心里就直哆嗦。”我说我也是那样。就好像真到鬼门关了，每天早上只要她一打铃我们真是心里哆嗦。

赵：条件反射。江青每天进办公室后，如果情绪烦躁就不停地按铃，秘书、护士一趟趟地叫。所以后来为缓解这种心情还吃药什么的，实在是没法在那儿待了，业务都荒废了，我在那儿待了四年，七一年到她那儿，七四年底我出来的。

周：有时候受了委屈也不敢当着她的面哭。你比如说在大会堂那一次，你想想看“人有脸树有皮”啊，守着那么多的人——二处的警卫人员，大会堂的服务人员，在三楼小礼堂拐弯的地方她拿一个杯子砸我，我只好偷偷流泪。流了以后还得干，那已经没有脸，没有自尊了。我可以这么说，真的没有自尊！

江青看不起工作人员

马：我就觉得她看工作人员是居高临下的那种感觉。你在吃饭上或者穿衣上等等都不能高于她，超过她。所以程师傅教我们：“老太太问你们吃什么，就说吃的萝卜、白菜，别说吃的好。”她觉得你们这些人是在我身边工作的，组织上是让你们为我服务的，你们怎么能吃那么好。

她平时说话办事当中对你就这样，话的口气都是比较看不起人的感觉，尤其对赵柳恩说话时，我觉得是特典型的看不起，似乎你站都没站的地儿，你站在那儿她看着你就不舒服。还让姜宝元半跪着跟她说话——你说哪有首长这样跟底下工作人员说话的？

我调到别的领导身边的时候人家都把我当成自己儿女一样。比如在彭真同志那里，有一次他打铃，我赶紧过去问“首长有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没事，来，吃西瓜”。在江青那儿是绝对没有这事的！只要她一打铃，一下是秘书，二下是护士，三下是警卫员。我们为此这根弦儿给绷得紧紧的，因为这铃一打我们这些人都开始为她服务了。她起床时是护士先去，别的人就赶快烧热水的烧热水，备早饭的备早饭，好像过去皇宫里那些服侍人员一样，专门为她服务。虽然后来慢慢就适应了，但总觉得这根弦绷得特别紧。到什么程度？有时刚吃饭这铃一打就得赶紧过去，然后一会儿又有什么事了你还得过去，总之一顿饭得分好几次吃，凉了再热，热了又凉，有时可能得好几个小时，甚至到最后就不吃了，反正我觉得她就是要使唤你，一有点什么事就叫你，不管你吃饭还是干吗都得立刻来。

她每天起床的时候我们帮她穿了衣服，上了卫生间，她再吃个早饭，然后要准备出去的时候护士总是得出去看风向，风大的时候还好看，风小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风向来，就得想各种办法，你不能说没风或者说不知道，更不能让她给吹风着。尽管这样做了，有时她想找茬的时候她就说她被风吹着了。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，你好言好语地讲，或者该批评批评，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，大家也是能接受的。但我觉得她对工作人员根本不是这样的态度，跟一般的首长区别很大。

幸亏周围工作人员的环境很好，我们大家在她那儿受了气以后，下面跟程师傅一聊、一说就完了，程师傅说：“她就是那样的人。她不光对你，她对谁都那样，对总理还那样呢。”这样一说、一劝我们心里也不那么憋屈了。

江青最怕她女儿李讷

李：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。在那个年代，别说工作人员，恐怕大人物们也没几个不怕江青的。据您的观察，江青怕谁——除了主席以外？

马：你说她怕主席吗？我觉得她第一还是怕李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对李讷实在是没办法。那一年主席在湖南长沙做眼睛手术的时候，我们陪着江青就到湖南长沙了，然后她就到主席那儿闹去了。

李：闹什么呀？

马：这个就是他们内部的事了。在她去之前王洪文刚从长沙回来，还给她送了一筐桔子，然后她又到湖南去了。

李：是不是为四届人大组阁的事啊？

马：没错，就是那个时候。她就敢去闹，她就是为这个事去的。可是对李讷呢？她自己的女儿她没办法。哪一年我记不清了，李讷和谢静宜等人奉命到东北搞了一次调查，回来汇报了，江青，好像还有主席，都说她们看阴暗面的东西多了。李讷很不满意，她说调查是你们叫去的，调查的东西你们又不相信。为这事，我听到李讷和江青吵，李讷用很大的声音说：“你想当武则天啊，你还没那个本事！”你看，李讷敢说江青这个！这话除了李讷谁敢当着江青的面说啊！

阎：我有一次和谢静宜谈话，她也谈到江青怕李讷的事。她说：有一年春节时，江青叫我（指谢静宜）替她去看看李讷——实际上她既惦记女儿，又害怕见女儿，所以她叫我替她去看看。

依我看，这是在江青晚年或在文革后期时的事情。记得在 1966 年秋冬，即文革开始不久，也是我还没当江青秘书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和李讷谈话，她跟我说：“人家是严父慈母，我可是严母慈父，我有点怕妈妈，不大怕爸爸。”到了文革后期，别说江青怕李讷，连主席有时对李讷也没办法。2001 年，毛远新从上海某汽车研究所退休后，来北京时曾到我家做客，他跟我说过一件事，就是毛主席拿李讷没办法的事。一次，李讷在主席住处又哭又闹，叫她出去，也不出去。主席没办法，跟工作人员说，快叫远新来，把她拖出去。毛远新说，他到后，总算把李讷劝走了。主席跟他说，李讷这是“佯狂自戕”。——当时我还不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毛远新给我解释说：“就是装疯卖傻自己作践自己。”我问毛远新：李讷为什么这样？他说，当时不是清查“五一六”吗？因为李讷在文革初期和造反派联系多，可能有人找她调查情况，或者叫她写什么材料，她觉得受不了了，于是就跑到主席那里诉说。接着，毛远新跟我说：李讷和他不同，1966 年，他是到九月份才参加文革，并且不在北京，北京的造反派他一个也不认识。

江青与总理

李：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怎么样？

马：其实说心里话，总理看在主席的面上，对江青既尊重又关心，从各个方面，甚至到人民大会堂的温度等各个方面都随着她，依着她。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，有一个厕所，本来谁都可以去，但总理为了照顾她，每次总理都是出来去别的厕所。

有几次她说身体不舒服，不去开会了，实际上没有什么不舒服，她看电影去了。看完电影以后，又打电话把总理叫来给她说开会的内容，也不管总理累不累。本来总理开会开了很长时间，很累了，又没有吃饭，邓大姐最关心的是总理上厕所的问题，老叫人提醒总理上厕所；再一个就是吃饭问题，总理一忙就是好多个小时不吃饭。

赵：我没法推测江青这是一种什么心情，你有心去看电影，怎么就不去开会？回来还让总理过来，使总理既不能按时吃饭，又不能按时休息。

周：我们工作人员又不能主动送吃的上去，她会说开小灶，拿她的东西送人情，做好人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，有一次总理好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了，警卫员高振普特别着急。这怎么办呢？江青住的十楼哪个警卫员都不允许进去，只能护士进去。后来我跑到程师傅那里说：给总理弄点最普通的，擀碗面吧，西红柿面。叫程师傅擀碗面我是冒了风险的。程师傅擀了两碗，因为江青吃过了，给她一个小碗，总理那儿给个大碗，我端进去以后，江青就说我也没吃，一下子把大碗拿过去了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太不通人情了，但总理不计较这些。还有几次送酥糖，特意给她说这是高振普叫送进来的，当时是想让她明白这些糖不是她的。

马：总理也确实没少照顾她。有一年十·一，人民大会堂举办一个活动，有西哈努克和夫人，通知她也参加，她是愿意参加这样的外事活动的。但是活动中可能西哈努克的夫人给她提了几个问题，她答不上来，就紧张，那个表情就不是太自然（后来发表的照片上能看出来），活动还没完她就出来了，总理也跟着，还帮她拉开车门给送走。当时我们觉得总理真是做得太好了，为你拉车门不都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吗？

李：总理住院以后江青一次也没去看过？

马：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没有。周总理去世的前一两天，江青在大会堂开政治局会，大家都知道总理病到晚期了，政治局就统一安排先后去看总理。那天晚上正好赶上我值班，随江青跟姚文元坐一个车去看总理。看完总理出来以后，江青在车上就跟姚文元说：“我以为总理不行了，其实他脑子还很清楚嘛。我到那儿的时候，他还睁了睁眼看了看我，我觉得他是认出我来了。”她认为今天这样组织不好，意思是总理还活着，还没到“最后”。当时我看到总理胡子都干巴巴的，脸色蜡黄，特别瘦，皮包骨头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前面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，依次看了看总理，大家心情都很沉痛，说话的声音也都很低，问候完以后慢慢出来，她跟姚文元看总理后却说那种话。

我陪她去的就是那一次，总理临终的那次。

李：总理住院以后还来看过江青吗？

马：没有。

周：我记得当时总理的追悼会，大家对江青的表现特别反感。因为总理去世时大家都是心里哭，她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居然不摘帽子！

马：她有思想准备。去参加仪式的时候，我问她是不是不戴帽子了，或者您是不是换个皮帽子，进门好摘？她说：“不用换，到那儿摘不摘帽子我还考虑呢。”结果到那儿她没摘。她对总理没感情，要是她对总理有感情她不会这样。

李：当年她整总理的时候你们应该是有感觉的？

马：有感觉，我们这个楼里不光是我，还有程师傅，大家都有感觉。

周：程师傅 75 年到我家看我时，谈到江青整总理的事很气愤，说咱们楼里的人都恨死那四个坏家伙了！

主席逝世前后

马：在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些事说一说。

从 1976 年 8 月 20 号起，主席身边有一个比较强的抢救小组在那儿值班，这个期间江青也经常去看看主席，她到底是怎么看我不知道。在这期间江青跟那儿的大夫说：“是不是给我也详细地查查身体？”你说那些医生当时多紧张啊，她还要凑这个热闹，大夫不敢违拗她，包括耳鼻喉科、口腔科全身给她查了一遍。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为她照胸片。她说要照，然后那边就要准备啊，一般她都是上午来，而这次照胸片时，医生从中午等到下午，下午等

到晚上，晚上等到夜里一、二点钟她不来。等她等不来那人家也就睡了；她夜里想起这事来又要来，通知大夫，夜里三点多钟这些大夫起来又折腾。我觉得她要查身体是可以的，那要由医生给她安排；她在抢救主席这么紧张的时候要大夫给她做检查实在不应该，那不是干扰吗？

还有一次，她拿着毛衣样子，叫里头的护士长教她怎么织毛衣。就那时候大家都很忙，她怎么能叫护士过来告诉她毛衣怎么织？！然后告诉这个护士说：“你们要学会给主席擦汗。”说给主席擦汗要把衣服都脱了，那时候主席翻身都困难，要脱光了不一会儿就得着凉吗？她进去怎么关心主席，怎么照顾主席我不知道。但是，她教护士给主席擦汗的这种方法，我们在外面听着就觉得不合适。

9月2号，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，我们跟着她去大寨了。1975年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，她去了一次，还在虎头山挖了一个备战沟。这次到大寨后她又去看，发现填平了，她特生气，把郭风莲叫来，批评郭说：“你们落后了，你们骄傲了！”郭风莲说：“我们挖好了涵洞，备战的时候可以当作防空洞，平时水涝的时候可以排水。”但江青仍然很生气，把郭风莲狠狠说了一通。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，照了好几张她戴头巾拿锄头、铁锹的劳动照片，还有和群众一块捆玉米什么的照片。那次她是照相热。此外，还骑马什么的。这次到大寨，她知道主席病重了，没有骑马、照相什么的，还是要摆点那个架子，她要搞一个大型的宴会，让好多人过来聚一聚，当时我们这些她身边的人好像都没那个心情。9月5号，就接到了要我们返京的电话，结果这样的宴会也没搞成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警卫员把要返京的急讯告诉她，她说：“你们先整理，整理完后告诉我，我先在这儿玩一会儿牌。”我们没看出她为主席的病有多么着急。大家都猜到是主席的病情有了变化，心里头一下子感到很急了，但是她的那一套还得按部就班的去做，我们把那些东西七哩八噜都收拾完了。收拾好后就坐火车从阳泉到石家庄，这一路上她也玩牌，到石家庄以后我们又坐飞机到北京，一共二十多分钟的航程，她还是坐在前舱里打牌。我就想，她跟我们周围人的想法真不一样，真看不出她很沉重、悲伤的表情，我们当时都很急、很沉重的，都在想主席怎么样了，感觉这个党就跟没着没落似的。

还记得在主席去世前，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（校订者按：1976年8月28天日），她还跑到小靳庄，兴高采烈地跟群众说：“我是代表主席来的，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！”她还说：“主席身体很好，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，你们想主席要不批准，我能来吗？”她让邢燕子、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给主席写信，写完信以后她说：“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‘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’。”当时还有一个女青年还写了一首诗也一块装到这个信封里头。她在小靳庄还召开了一个群众会，她在会上讲了很多话，我不可能全记住，但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讲到生产力时候，她说：“人呢，是最大的生产力，是最重要、最活跃的因素，无论是男人、女人，都是女人生的，男人只提供了一个精虫，氏族社会的发展，开始是母系社会女人掌权，以后发展到男人掌权，今后是如何还得看发展。”她当时这么讲，我听了觉得很惊讶，她在会上怎么讲这些话？这是什么话！

在主席整个病重期间，我觉得她挺忙的。有一天夜里大概十一点钟左右，她跑到新华印刷厂去看望地震以后的生产情况。她就表示关心工人，当时工人早下班了，只有几个工人在那儿值班，就跟这些人见见面，问候问候。有天晚上又去了清华、北大校园，去看望师生们。这都是在主席病重期间。她走到那儿我得跟到那儿，所以我觉得很累。

主席去世以后，中央决定把主席的遗体送往人民大会堂，想让江青看看再送，可是江青的动作很慢，慢条斯理地一点不着急，她说：“我得先吃好饭，要不看到主席这饭就吃不下去了。”吃完饭以后，参加送主席的遗体，当送主席的车出中南海的大门口的时候，我们送的人都哭了，但没看到江青怎么掉泪。那天，运遗体的车在前边，我们坐着车在后边跟着，我当时以为会随着主席的灵车一起进大会堂，但是主席的灵车出了中南海，我们的车回来了。

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：怎么就回来了呢？这不合常理啊。这个事我印象很深。

和主席去世有关的，我还记得两件事。

一个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，把毛衣什么的全都染成黑色，还订做了一套黑色礼服，一个很大的乔其纱黑纱巾，四条黑色手帕，都是乔其纱的，那种手帕因为不吸水，要是擦擦眼泪，擦擦汗很不方便。后来她问我们她穿这身衣服好吗？我们说可能大家会有些看不习惯，再说大家都在给主席开追悼会呢也不会在意你穿什么衣服，她说：“开完追悼会以后会有外宾照相，那照片一公布大家就会注意了。”所以，她很注意穿着和照片。这种事虽然是在情理之中，但我当时觉得太表象化了。

再一个，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，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。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：凡是写“政治局委员江青收”的放一摞，凡是写“毛泽东夫人江青收”的就放在另一摞。她对写“毛泽东夫人”有意见。她拿着“毛泽东夫人江青收”的信给我看，看完以后连打开也不打开，往一边一放，她不愿看这个。她说：“他们拿我当夫人看待，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——当然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。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。”实际上，我们感觉她说这话指的是邓颖超，虽然她并没说明指谁。我觉得她对邓大姐一直不满，说“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妇女。”而对自己她是比较高估的。

毛主席去世后她到主席房间里去，当时主席的东西还没封存，她去了后就翻东西。后来汪东兴他们把那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。她对封存主席的东西很不高兴，说“主席的尸骨未寒就对我这个样子。”大发脾气。她回到二〇一后，就拍桌子，扔东西，还是说：“主席的尸骨未寒就对我这样，对主席的家庭，对他的遗属这样！”主席去世后江青请张玉凤吃饭，那时候就感觉到她想和张玉凤拉近一点儿。

李：主席去世后您见过她流泪吗？

马：我真没见过，反正在我班上我是没见过。

李：您觉得她心情怎么样？她是无所谓啊，还是比较沉痛啊，还是反而有些兴高采烈呢？

马：那一段我们跟着她东跑西颠的，安排了很多活动，一句话，江青的悲痛不大能看得出来。

以前江青跟我说过几句话，怎么提起来的也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很牢。有一次，她在我们楼的大厅跟我说：“你在我这儿工作，我是做政治工作的，是主席政治方面、国际方面的秘书。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。你到我这儿工作难道你不高兴吗？”她就这样问我。“不过在我这儿工作呀也是有风险的，到时候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，不过也可能把我软禁起来。杀头我不怕，我就怕这个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。”那阵我就是三十岁左右吧，听了她这些话就觉得挺害怕的，我们都是和平年代过来的，当时没理会到这其中的深刻的含义，现在想想，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来说早就有这个精神准备了。

参与抓捕江青

马：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。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期四，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〇一。那天我已经下班了，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，穿着双拖鞋。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来，我一看张局长站在我跟前，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。我说，咦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感到很吃惊。他说：“小马跟我来一趟！”他一看我穿着拖鞋呢，他说：“你把鞋换一下。”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我也不洗了，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掉，跟着他后边走。我也没问他什么事，但是那时候吧我的心里就意识到有事，而且也意识到就这类的事情。就跟着走，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，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不多问。跟着走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，他说：“你开开门咱们进去。”我一到门口呀，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，两边全站满了武装战士，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，我觉得这事就严重了。张局长说：“开门进去。”我就把门开了，什

么都没说就进去，张局长就跟到我后面进来了。我们进门以后，看到江青在那儿半躺着，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，一个脚垫踏着，她那儿两边不是有很多文件吗。我就站在那儿，张局长随着就跟她说：“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……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。”就宣布了这个。宣布以后江青就说：“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。”很短的几句话，张耀祠又给她念了一遍。她做了一下调整，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，然后就低着头，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，在琢磨这事。张耀祠说：“把钥匙该交的就交一下。”她说：“我交给谁呀？”“你就交给我。”江青站起来，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，装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，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，很从容的，然后写上“交华国锋同志收”。她自己就提出来我要上趟厕所。张耀祠说：“你去吧。”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，她去了。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说：“给她准备准备东西”。我把她的衣服，换洗的，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，拣好了给她装进箱子里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，很快都收拾好了。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，出来一看她还在厕所，还没出来，这个时间大概得有十分钟吧。张耀祠就说：“你进去看看。”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，她正蹲在那儿发愣呢，我进去也没说什么，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她。她就稍微想了想，看看我，没说什么话，然后就慢慢悠悠地起来，从卫生间里出来。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，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，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，一直在想事情。我把大衣给她披上，她在前面走，我跟在后面拎着箱子。打开门，一看有一辆保险大红旗（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有车子），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，都是警卫团的，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、马盼秋、高云江，高云江是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。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，一边是马盼秋，江青坐在中间，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。高云江坐副驾座上。

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，看不太清楚了，黑乎乎地就走了。

新的角色：在地下室看管江青

李：从这一刻起，您和江青的角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。

马：是啊。上了车，车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，她也没问什么。车一路开，一直开进地下室，在地下室就转，转了半天。我们下车以后，进了一个房间，一看，我觉得我来过这个地方。周围都是半人多高水曲柳的墙，因为主席的遗体放在那儿的时候江青和姚文元去看过主席的遗体，我陪着去的，所以一进去我就看出来了，我想江青也应该看出来了。一进去，我和江青先在小屋子的床上坐了会儿，江青就问我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说我也不清楚，她又看看，那儿有个台历，看后她也没吭气，但是，我想她看后心里也已经有了数了。

开始我们在那儿歇了会儿，待会儿就把她弄到套间里去了。她最初歇脚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值班室，有个大厅。她在套间里头，房间大概十二到十四平米，有一张床，一把椅子，一张桌子，有个水池子，有一间卫生间，有个澡盆，应该说环境还是比较好的，条件比较好。反正从那儿就开始了她的这种生活。

高云江向她宣布了几条规定：在这儿你没有报纸看，可以看书，有毛选，你要是想写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纸给你笔。反正给她规定了几条吧。她听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反驳。江青开始几天什么也不做，后来慢慢地，她就开始写点儿东西。

在生活上他们也给我交代了，说：“你现在不能再像以前做护士那样什么都照顾那么周到了，但是别人又不了解她，不好插手，你得在生活上招呼她，但又不能像护士那样亲近，要掌握这个尺度。在生活上，她自己可以自理的你要教她自己做。”

当时我的心理上就感觉特别复杂！我第一个特别想赵柳恩，我想我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地告诉赵柳恩啊（哽咽……），她得多高兴啊！……终于有这么一天了！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这是第二次解放！

说实在的这真是心里的感觉，别人可能体会不到。

李：完全可以想象您当时的感受。不知道江青本人怎么适应这个变化？

马：江青到了这里，可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首先是吃饭，正餐是一荤两素一汤，开始她吃不下去，说这饭菜不想吃。不想吃工作人员就拿走，后来慢慢地她就吃点了，以后连窝头都要吃半个，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，就比较正常了，跟从前吃的量差不多。偶尔便秘，她还主动多吃点粗粮。我觉得她后来也想通了。

再就是睡觉。睡觉是她一贯的老大难问题，刚开始她可睡不着，折腾，就是把被子一会儿挪到这头来，一会儿挪到那头来，她也不知怎么好——睡不着啊！那都是硬板床，你想这么多年她哪里睡过这种床啊？睡不着就睡不着，睡不着觉了就看看书，拿毛选给她看，就是不能给她安眠药。她就整夜地不睡。我说那你在床上休息会儿，睡不着也躺在那儿休息。她也躺着，她也听我的，但她没有睡。因为她的门得敞着不能关，你想我们这都得是公开的，黄介元他们都在这儿坐着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都在那儿站着，她不敢轻易地去说什么话。开始睡不着，后来熬着熬着不知不觉呼呼地也就睡了，人到那种程度也逼出来了。大概三个月以后，她的睡眠逐渐正常了，有规律了。每到晚上，她看我们人少了，比如我也去睡觉了，她也在那儿合衣呼呼睡了。她从来不脱衣服。因为门不能关，大家都看着，所以她要换衣服就在卫生间小房里换。有时候我想，这环境真是改造人啊，这会儿没有安眠药她也睡得挺好，也不嫌水啊热了冷了的，所有那些讲究都没了。

江青生活上自理也有一个过程。开始她不会洗衣服，没用过洗衣粉。我说你自己试着洗衣服。她说用什么洗啊，我说你就用洗衣粉洗。她拿来洗衣粉就往衣服上倒。我就告诉她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就把衣服弄坏了，你得先把衣服放到水池子里，然后把洗衣粉融化到水里，衣服弄湿后再洗。因为她一开始已经倒了洗衣粉了，就直接把衣服弄湿后洗的，然后搓。她搓不干净，那也只好那样了，反正我告诉她了。后来，她又拿着抹布自己擦擦桌子，再擦擦床，都是慢慢地学，我开始也帮她弄弄，后来就不管了。我看到她写的日记（她写的东西都是公开的，都在那儿摆着），有一条说：“就连小马过去那么温和的，温顺的人，现在也要想骑在我的头上。”其实，我对她真没那么“横”，就是没以前那么体贴周到了。

在这期间，开始几天特别难过，因为我白天要陪她，晚上她不睡觉也得要在那儿陪她。她进到地下室的一个多礼拜，我每天就睡一个多小时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比较大，精神上也不是太好。就觉得我这护士怎么又变成看守了？这是我的事吗？有时自己想不通，我本来睡觉就不好，又加上连续这么几天心里浮躁，想的东西乱七八糟理不出个头绪来，好像说这里面怎么这么乱，心里很烦的。

于是想找他们要点安眠药，我觉得首先得把觉睡好。我就跟我们送饭的俞师傅说，你给我拿点药吧。他问什么药呀？我说治老毛病的。结果他给我送来了活血化瘀治月经的药。我一看说，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啊？他说那送什么呀？我说治睡不着觉的安眠药。他说那我拿得来呀？他们不会给我的，我要给你送了还不惩治我呀？我也不能让你吃啊。我说不行啊，你要不给我拿来，时间长了我真觉得受不了啊！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，有责任我自己担着。又过了一天，他给我带了六片速可眠，哎哟，当时看到速可眠我如获至宝！吃了那个药，睡了一觉缓过来了。

大概一个多月以后，我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就跟上面提出再找一个人替换一下，不然我真顶不下来——这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。整天也见不着太阳，睡不好觉吃不下饭，再好的东西我也吃不下去，他们看到我那样也不行了，后来就打了个报告。找谁呢？后来从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一个叫陈世冠的服务员，叫来给我替换一下，那我就觉得好多了。

杨：黄介元下命令叫江青打扫卫生？

马：对。黄介元说话挺严肃的，就站在那儿：“江青，你得自己打扫你的屋子，擦擦桌子，搞搞卫生。”她就看看他，不是你说什么她就马上干什么，她不会的。他说什么，她装

作没听见一样。但这种事情黄介元说过好几次，后来给她扫帚让她自己扫，她就自己扫，给她拖把，她自己就擦，而这大概是过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。开始的时候她自己整理桌子，自己穿衣服，自己洗衣服，就是这个。因为说实在的，她那个屋子也没什么东西，没什么可搞的。一般吃完饭把托盘往那儿一放，就让她自己把碗筷放在盘子里，我或者是战士给端出去，桌子让她自己擦擦。

李：她这期间跟你谈过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吗？不能一句话不说光待着吧？

马：唉呀，这个你觉得不应该是吧？

李：我觉得不应该，您想在这地下半年时间两人面对面什么话都不说，这很难让人想象。

马：实际上挺尴尬的。话呢可能也说，具体的也记不清了。她有时也问，但她问什么，我也都回答不知道。

李：她都问你什么呀？

马：她好像问过外面的谁，但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了。

李：是政治方面的、形势方面的吗？比如华国锋、邓小平如何如何？

马：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。

李：她自己写东西的时间多吗？

马：不多。

李：她是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，还是简短的两三条呢？

马：就写两三条，想起来了就写，每次大概写个十几分钟吧。

李：她最后交上的东西你没看内容，但您看大概量有多大啊？

马：反正它每张纸也写不满，有时给她收一下，有点什么都给收走了。

李：大概有一寸多厚？

马：嗯，差不多。

李：上面也没什么抬头，如什么中央办公厅之类……

马：对，没什么抬头。铅笔写的。红蓝铅笔，一直是红蓝铅笔。她用惯了铅笔，她也不乱划拉。

李：在毛选上她没有什么批注？

马：没有，没有。毛选她就是翻翻看看，但她不常看，她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她是摆样子。她实际上是坐在那儿，你想她什么时候过过这种生活呀？你在那儿监视着我，我在这儿坐着，那个滋味挺难受的。现在看来这个政治犯对我们是有戒心的，她对我们有戒心，我们对她也有戒心。

李：这个期间有人来审讯吗？

马：我印象里对她好像组织过一次，这是黄介元他们组织的。我跟你们说黄介元的出面率是最高的。黄介元，年轻，有勇气，也敢说，比如交代江青干活，就说：“你怎么还不干？这就是你的工作！”她说：“我没干过。”“没干过有人教你啊？”都是这种话，别的也没有什么。

杨：黄介元当时是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，第一个是脸色很严肃；第二个声音大、粗。

马：对，反正说出话来让人害怕，有一定的威力。

李：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审讯是吧？

马：在地下室没有。

李：有没有领导人下来？

马：没有。那时候就是保证她安全活着，不要出现什么事。

李：就是除了这几个看押人员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外人进来？

马：没有，就有一个给她送饭的司机。给我们送也给她送。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，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。

对了，我给他们提意见，我说在这儿太难受了，都三个月了不见太阳，就觉得人失去正常的状态了，能不能有什么调节一下？后来他们说：“就你这提议，给我们批了个太阳能灯下来。”大家轮流坐在那儿照一照。我一直待在那儿三个月，后来中间让我回去了一趟。

江青在地下室关押期间的作息

李：她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？

马：开始我觉得挺乱的，但所谓的乱就是她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地折腾，她也不知怎么好。她也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因为她没有表，有时问问我几点了。后来她睡眠逐渐好了，基本上有规律了，可能是在三个月以后，每天到了晚上她就去睡了。

李：她一般睡觉都在十点来钟？

马：十点钟她不会睡的，睡不着。大概十一、二点睡吧，睡眠还可以，比我都好，有时还有点小呼噜。早上大概六、七点钟，有时五、六点钟醒来，但这个时候少，一般都是六、七点钟起来，起来以后自己刷刷牙，洗洗脸，梳梳头，反正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弄，毛巾也是自己洗，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很正常了。我看过《溥仪的后半生》，江青学会自理生活跟溥仪差不多；当然溥仪是从完全不会到会，江青从有了特权后自己不做到自己做。

上午有时她自己在屋子里散散步，不出她的屋子，就从她的大屋子到卫生间，从卫生间到大屋子，来回这么走走，有时是背着手，像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有时坐在椅子上翻翻书，有时就写写，一天基本上是这样。中午吃完饭她也睡会儿觉。大概躺一个小时，不一定能睡着，我们不叫她，她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。

李：她上午和下午基本做的事都差不多，实际上是没事？

马：确实没事。她所谓的事就是吃饭、睡觉、散散步，然后看看东西，写点东西。她坐在凳子上，桌子上有一摞书，还有纸、笔，就像在家里，但不像在家里办公，在这儿她就拿着一本书翻着，你也不知道她看还是没看，她看了几页你也不知道，这个时候我们不好靠近她去监视，但是我们只要看她在那儿看书，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就行了，其它的一般不管。看书她都坐在凳子上，从不躺在床上看书，要躺就躺在床上一会儿。她这段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，想看书就看书，想写东西就写东西，想散步就散步，想上厕所就上厕所，她只要不违规，一般不去管她。

刚到看守的地方她就有过一点“反抗”。所谓反抗，就是她说：“我没法睡，你们一个说话声音大，一个走路的地板声也大。”她说这话，我也没法跟她解释，环境就是这样。黄介元对她说：“你能睡就睡，不能睡你就干别的，这里条件不可能像你过去那样。”她反对也没办法。

李：她有没有大吵大闹的时候？

马：没有。情绪上肯定有大的波动，但她没有表现出来，没有像有些人似地胡搅蛮缠。天天看她还是利利索索的，一点儿都不邈邈。

李：她的衣服这时候是不是都变成黑的了？

马：大部分是，也有蓝的。主席一去世她把所有的衣服，毛衣什么的都染成黑色的了。我在那儿的时候她都是穿自己的衣服。

去秦城监狱之前，我接到命令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她出来时穿什么衣服还给她带什么衣服，给她打理好，然后放在车上，我和她一块坐在车里走的。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好，光线也特别好，一直走了很远，走到秦城，就到监狱了……

把江青送到秦城监狱

李：请你把这个过程说细一点儿。

马：1977年4月10日，交接押送任务下来后，黄介元给我打了招呼。他说：凌晨要转移地方了，先让我自己作好准备，把她身边的东西都拾掇好。我们一切都听黄介元的指挥，他问我：“你们的東西都准备好了没有？”我说都准备好了。然后他就走到江青的门口（他一般就站在门口不进她的屋子），对江青说：“今天要换个地方，戴上这个吧。”江青说：“好吧。”缓慢走进卫生间，出来后，顺从地戴上手铐。

我带着江青的衣物和她坐在一辆车里，她一路上没说一句话。

李：江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？

马：没有。有时候外边传的跟实际情况有天地之别。她当时确实是很平静，她对于自己的道路好像早就料到了。到秦城监狱后，两名女狱警把她架进了牢房……

李：架进去的？

马：反正一边一个把她带进去了。监狱的人把江青带进去，我们向狱警介绍了江青的饮食和睡眠等，交接了衣物。送她的人就随着车回来了。

李：你当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了？

马：意识到了。但是我想国家不会把她怎么样，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。但是她不会有太多的自由，这个是肯定的。

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7年4月10日，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“四人帮”的任务胜利完成，总共187天。这六个多月，我都过糊涂了，一直以为是三个月，中间我只回过一次家。这一天是我几个月以来又可以呼吸清新空气、重新沐浴温暖阳光难忘的一天。

李：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？

马：我就觉得解放了！对她这种下场、这种结局，我觉得也是预料之中的。回来以后我就想到和我一块工作过的人，就是能够一块说话的人，尤其是小赵，我想告诉她，让她高兴高兴：江青也受管制了！当时我真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，好不容易从那儿出来了！我赶紧回到家里，看到我爱人，他简直瘦了一圈，不认得了，很激动，说着没完没了的话。

（阎长贵、李宇锋整理，杨银禄、周淑英、赵柳思校订，未经本人审阅）